

西域

中外文明交流的中轉站



中國文化中心講座系列

香港城市大學
中國文化中心 編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K2/P4
2011/2

西域

中外文明交流的中轉站

主編：鄭培凱
責任編輯：郭錦鴻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鳴謝

本書部分圖片承蒙下列機構及人士慨允轉載，謹此致謝：

日本神奈川大學廣田律子教授

文物出版社

北京考古雜誌社

北京圖書館敦煌吐魯番資料中心

本社已盡最大努力，確認圖片之作者或版權持有人，並作出轉載申請。唯部分圖片年份久遠，未能確認或聯絡作者或原出版社。如作者或版權持有人發現書中之圖片版權為其擁有，懇請與本社聯絡，本社當立即補辦申請手續。

©2009 香港城市大學

本書版權受香港及國際知識版權法例保護。除獲香港城市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媒介或網絡，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數碼化或轉載、播送本書文字或圖表。

出版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香港九龍達之路

香港城市大學

網址：www.cityu.edu.hk/upress

電郵：upress@cityu.edu.hk

©2009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long the Silk Road—East-West Cultural Exchang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ISBN: 978-962-937-166-1

Published b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Hong Kong

Website: www.cityu.edu.hk/upress

E-mail: upress@cityu.edu.hk

Printed in Hong Kong

總 序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傳統的政治、經濟、社會體系，受到西方列強的衝擊，幾乎土崩瓦解，經歷了充滿創傷與痛苦經驗的轉型。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人的生活體驗，也隨着西潮的波濤，在巨浪滔天的環境中載浮載沉。晚清的自強與改革，其實是自救與圖存，清清楚楚認識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機。先是軍事的改革，「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再來是經濟的、政治制度的、社會結構的改變，前腳還未離開，後腳又到。自強運動不靈，便有戊戌維新；維新失敗，便有辛亥革命；革命推翻帝制，卻帶來了軍閥割據，引發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激起文化階層的意識變動，之後更深入到民間，調動全民的參與。國民革命繼之以共產革命，革命之不足，還要「繼續革命」，一直革到文化大革命，文化砸爛，斯文掃地，到了革無可革之時，這才否極泰來，「待從頭收拾舊山河」。

文化依存於人的生活。當一個民族經歷着百多年的生死掙扎，一心只想着救亡圖存，其文化心態當然也就很難平衡，總是大起大落，大取大捨，矯枉過正。到了21世紀，大多數人都認識向西方傳統學習的必要，但激進者卻一定要喊出「全盤西化」；大多數人都不會反對保存固有文化中的優良傳統，但國粹派卻一定要提倡「尊孔讀經」；大多數人都了解應該汲取多元中外文化傳統的滋養，但在文化論壇上卻仍能聽到「打倒孔家店」、「崇洋媚外」、「推翻吃人的禮教」、「痛打帝國主義的文化走狗」這樣的充滿激情與暴力的偏執口號，交叉喊話，來回挑釁。

從文化繼承與發展的角度來看，近兩個世紀的環境不但惡劣，而且充滿了摧殘生機的陷坑與風暴。在這種文化環境中成長的心靈，也就難免畸型，充滿了戾氣與不平衡的心態，以為「除舊佈新」、「破舊立新」可以開創美好的未來。更以口誅筆伐的手段來排除異己，建立輿論權威。不僅一般社會中瀰漫着「推倒重來」的文化態度，連學術界的研究也急功近利，甚至配合政治運動，實踐「矯枉必須過正」的荒謬理論。

當追求知識的人不能與現實利益保持距離，不能以長遠的歷史文化作為認識的座標，只幻想着當前的參與與投身，希望通過批判與改造來創造文化，以達成士大夫「先憂後樂」或「知識分子良心」的願望，他們就忘了人類文明累積的「知識」為甚麼是寶貴的文化遺產。把文化遺產當作實用工具，企圖謀求個人名利，固然是下焉者；企圖謀求國族復興之道，把文化轉為政治與經濟運作的附庸，也不見得是人類的長遠之福。現在的社會太着眼於功利、太講究價格與利潤、太迷信當前的實效，完全忽視了生活的品質、人文與大自然的協調、生命的快樂與幸福。我們看到許多政府、大財團與跨國公司都在經營文化事業，表面上是重視文化與生活的關係，也算好事，另方面卻以麥當勞與迪士尼的經營理念使文化庸俗化，變為賺錢的工具，則有損文化的長遠發展，同時阻礙一般人文化修養的提升，讓人沉迷於單調無聊卻能暫時刺激感官的活動。

近來我出版了一本文史哲藝隨筆集，以《高尚的快樂》作為書名。這裏摘錄兩段，說明我所謂的「高尚的快樂」是甚麼：

古希臘哲學家德謨克里特 (Demokritos) 是蘇格拉底同時代人，寫過很多關於藝術的著作，可惜大都散佚了。幸存的殘篇裏有一段話，充滿了智慧：

「不應該追求一切種類的快樂，應該只追求高尚的快樂。」

甚麼是高尚的快樂？德謨克里特沒說。或許他說過，卻散佚了；或許他從未具體討論過，因為他認為那不用多說，是人人都知道的。不管他說過沒有，這段話還是充滿了質樸的智慧，因為明確指出了，快樂有等差，並不是所有的快樂都高尚。

問題還是回到：甚麼是高尚的快樂？也許 18 世紀的康德在具體分析美的藝術時，提供了解釋。康德的《判斷力批判》把藝術分成兩種：為了感官享受的「快適的藝術」，與提供反省快樂的「美的藝術」。前者「單純以享受做它的目的……叫人忘懷於時間的流逝」；後者則「是一種意境……雖然沒有目的，它仍然具有促進心靈諸力的陶冶以達到社會性的傳達作用。」（宗白華譯）

也就是說，高尚的快樂是要超乎感官享受的，絕不能只停留在康德所謂的「當前的歡娛消遣」。

人類創造文明，追求文化與藝術的發展與提升，使自身的性靈更美好、更高尚，是人異於禽獸、作為萬物之靈的展現。每一個文明的高度發展，雖然牽扯到各種錯綜複雜的階級與人際衝突與鬥爭，但放在長遠的歷史脈絡中來看，總體的累積卻明確顯示，人類企圖藉着文化的創新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中國文化也不例外，累積了五千年以上的經驗，其中有成功的愉悅，也有失敗的痛苦，有造福人群的績效，也有殘害蒼生的教訓，是我們走向未來的借鑒，更是我們創造明天最寶貴、最實在的資源。只有充份掌握了自己身邊的文化資源，我

們才會了解為甚麼社會的發展要均衡，為甚麼人際關係要和諧，為甚麼應該愛好和平、反對戰爭，為甚麼追求經濟效益不能唯利是圖。

香港城市大學於 1998 年開始創立中國文化中心，在校長張信剛教授的策劃下，規定全校學生必修六個學分中國文化課程，以奠定大學生最基本的人文素質。在全校各院系群策群力的支持之下，順利推展了一系列教學新猷，如網路教學、中國文化與藝術示範講座、文化古蹟考察等等。為了舉辦文化講座，我們盡量網羅海內外的碩學名儒，到城市大學來，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與大學生探討各個學術領域的新知。進行了四年，成績斐然，而且累積了令人羨艷的演講材料。

這些從不同學術領域探討中國文化的講辭，凝聚了講者幾十年研探的心得，用淺易明白的方式表達出來，不但是大學生踏上學術道路之門徑，也是一般人瞭解中國文化的方便法門。有鑒於此，我們徵得講者的同意，又得到校方的大力支持，由本校的大學出版社推出這一套「中國文化中心講座系列」，盼能為中國文化的創新盡點綿薄之力。

這套系列從構想、企劃，到印成白紙黑字，貢獻最大的是中國文化中心的老師及城大出版社的同事。我還要特別感謝張信剛校長、高彥鳴副校長及黃玉山副校長的鼎力支持，更感謝出版社鄺子器社長的投入及范家偉博士孜孜不倦的協助。中國有句俗話，「眾人捧柴火焰高」，也就是集思廣益、集腋成裘的意思，但表達的感覺要積極進取得多，充滿了樂觀向上、欣欣向榮的心情。我們推出這套「中國文化中心講座系列」的過程，也充份體會了這種群策群力、合作無間的精神，與城市大學的校訓「敬業樂群」（語出《禮記·學記》），倒是若合符節。

既然提到了《禮記·學記》，讓我在此引幾段經典，與同事、同學，及所有愛好人文修養的朋友共勉：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

我們出版這套叢書，也希望能夠教學相長，開創中國文化的未來。

鄭培凱

2002年11月1日

序 言

在規劃中國文化中心的學術講座時，我把中外交通史與西域研究當作一個重點，邀請了許多國際知名的學者，來到香港城市大學，就古代中外文明交流這個領域，從不同角度及不同議題，探討人類物質文明擴散的軌跡，追索文化習俗的傳佈，以及相互影響的過程及遞變的蹤影。本書包羅的文章，僅就各家諸多精彩講座之中，各取一鱗，展示西域研究的光譜，不但十分寬廣，而且五花八門。其中所涉及的文獻與考古材料，經過精心的組合，就像萬花筒一樣，顯示出五彩眩目的圖案，閃爍着文明接觸與碰撞所產生的火花。

從歷史地理的角度說，本書涉及的地域是「西域」，以及通過西域、聯繫歐亞大陸古代文明的絲綢之路。歐亞大陸古代文明的發展，就其地域而言，分別形成地中海東（再細分為埃及、兩河流域、及希臘羅馬）、南亞印度、及東亞中國三大區塊，各有其相對獨立的自主性，發展出面向不同的文化形態。然而，這三大區塊之間，並非完全隔絕，而其互通聲氣的管道就是通過西域的絲綢之路。

過去有不少學者探討西域的地望四至，有人逕指今天的新疆，也有人包括隴西走廊，還有人強調蔥嶺及阿姆河以西迤北地帶都屬「西域」。學者也時常糾纏於絲路的起點，甲說長安，乙說洛陽，丙說敦煌，丁說酒泉，戊說陽關與玉門關，不一而足。至於絲路的終點，更是眾說紛紜，產生不少爭論。近來學者得到大體的共識，即是，從歷史文化的考慮出發，「西域」的定義，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其不同的範疇與概念，籠

統言之，就是三大區塊之間的「亞文明地帶」。稱之為「西域」，是以中國文化為中心的地域觀念投射，是中國文明本體地域之西的泛稱。而「絲綢之路」作為通稱，也不是一條聯絡東西的「陽關大道」，而是聯繫起三大文明區塊的交通網絡，有流通的主動脈，也有涓滴相連的毛細管，之間還有一些錯落複雜的管道。因此，也就有了「高原絲綢之路」、「西南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絲綢南路」、「絲綢北路」、「絲綢中路」……等不同的稱呼，來應對不同的具體綫路。我們看待本書不同作者道及「西域」與「絲綢之路」，時有不同指涉，應當理解，其間有泛指的「通稱」，也有特指的「專稱」。作者是清楚的，也提供了明確的指涉脈絡，我們作為讀者，也應當概念清晰，就具體的情況來了解。

本書包羅的面向很廣，乍看之下，似乎不成系統：霍巍探討吐蕃在中外交流所扮演的角色；蔡鴻生探索西域獅子形象傳入中國及其演化；柴劍虹介紹敦煌地方志書所呈現的地方特色；金文京從敦煌變文及廣西儺戲中「舜子故事」的相似情節，分析民間傳說的流佈脈絡；榮新江討論粟特商人及粟特文化在絲綢之路上的地位；趙豐從吐魯番出土的紡織品探討絲綢工藝的發展；齊東方從考古出土的金銀器思考物質文明的交流；林梅村專注漢代西域地區藝術所受到的希臘影響；張廣達則結合了考古資料與中外文獻，描繪了豹獵文化習俗傳入唐土的異國情調。然而，通讀全書，就會發現，西域作為東西文明的中轉之地，多元文化接觸碰撞，不同的文化因子得以傳播，產生多彩多姿的影響，在人類文明發展上扮演了絢麗的角色。

鄭培凱

作者簡介

- | | |
|-----|----------------------|
| 林梅村 |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
| 金文京 |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 |
| 柴劍虹 |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秘書長 |
| 張廣達 | 前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
| 榮新江 |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
| 趙豐 | 中國絲綢博物館副館長 |
| 齊東方 |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
| 蔡鴻生 | 中山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 |
| 霍巍 | 四川大學考古學系教授 |

目 錄

總序	vii
序言	xiii
作者簡介	xvii
一 中古時期的「高原絲綢之路」—— 吐蕃與中亞南亞的交通 霍巍	1
二 西域獅子的華化形態 蔡鴻生	25
三 敦煌方志寫本的地域特色 柴劍虹	41
四 敦煌《舜子變》與廣西壯族 師公戲《舜兒》 金文京	55
五 絲綢之路上的粟特商人與粟特文化 榮新江	75
六 吐魯番地區紡織品的發現與研究 趙豐	91
七 碰撞與融合——絲綢之路上的外來金銀器 齊東方	111
八 漢代西域藝術中的希臘文化因素 林梅村	133
九 唐代的豹獵——文化傳播的一個實例 張廣達	157

中古時期的「高原絲綢之路」—— 吐蕃與中亞南亞的交通

霍巍

許多學者都曾指出，在公元 7 世紀最初的 25 年當中，亞洲大陸興起了三大強國，每一個強國都對後來兩個世紀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亞洲的東方，中國處於它最為強盛的唐朝（618-907 年）；在唐朝的西面，在青藏高原興起了漢文史書中所稱的「吐蕃」，由其著名首領松贊干布建立起統一的高原帝國；而在西方，阿拉伯人迅速興起，成為中亞最為強大的勢力，中國史書中稱其為「大食」。其中，吐蕃帝國從 7 世紀後半葉以來隨着其力量的不斷強大，開始與唐朝和周邊的南亞、中亞各國產生密切的聯繫，伴隨着衝突與對抗，吐蕃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文化交流也時有發生，由此形成的交通路線被後人稱為「高原絲綢之路」。本文主要介紹吐蕃與中亞、南亞等周邊國家或地區之間中古時期的交通路線及其文化交流等問題。

一、吐蕃進入中亞地區的主要通道

這裏所講的「中亞」，也包括中國的新疆地區，即傳統上的「西域」在內。吐蕃最早開始出現在中亞，據日本學者森安孝夫的考證，是在吐蕃芒松芒贊時代，相當於中原唐王朝龍朔二年（662 年）。森安孝夫認為，從地理條件來看，當時吐蕃連接中亞的路線一共有兩條：一條是從西藏中部（吐蕃王朝發祥地）至西北的喀喇崑崙、帕米爾路線；另一條是自西藏東北往青海、柴達木的路線。

事實上，從文獻上來看當時還並不止這兩條路線。至少我們還可以舉出兩條：一條是西經勃律、繞道蔥嶺進入西域的「勃律道」，這條路線已有眾多的研究者進行過討論。而另一條，則是由吐蕃經過象雄（羊同）、過迦濕彌羅而進入中天竺的路線。據《新唐書·西域傳》載，這條道路扼控吐蕃向勃律的進出，也稱為「吐蕃五大道」，筆者認為這很可能即為「勃律道」之一段。上面諸道中，從西北喀喇崑崙、帕米爾進入西域的一道，也稱之為「中道」，具體來講又可細分為兩條路線：一條即穿越崑崙山與喀喇崑崙山之間的阿克賽欽地區路線，另一條則越過于闐南山（崑崙山與喀喇崑崙山）進入西域，或可稱之為「吐蕃—于闐道」。後面我們將論述于闐與佛教傳入西藏之間的關係，所以，這裏首先對「中道」的情況稍作分析。

吐蕃與于闐的相互地理位置，在漢文史料中已有記載。如《隋書·西域傳》于闐國條下載：「于闐國，都蔥嶺之北二百餘里。東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國三千里，西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龜茲千四百里」。所謂女國，即漢藏文獻當中所稱的「大羊同國」或「象雄」。《釋迦方志》亦載：「大羊同國，東接吐蕃，西接三波訶，北接于闐。」所以，從吐蕃去于闐的道路，其起始點似乎不應如森安所云起自西藏中部，而應起於西藏西部的象雄。

中道的開通，溝通了西藏西部與中亞的聯繫，其影響極為深遠。但是，關於中道開通的時間，在文獻上卻沒有明確的記載。近來，有學者從女國（羊同）與北方突厥的關係上來探索這條道路的鑿通，提出二者之間可能存在有一條古老的「食鹽之路」，即「女國從北方的突厥地得到食鹽，再向南販往天竺和吐蕃」。但實際上，筆者認為羊同本土也是重要的鹽業產地，不一定非要到北方的突厥地去獲得鹽不可。《隋書·女國

傳》中明確記載女國「尤多鹽，恒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不是沒有根據的。

從近年來新發現的一些考古材料上看，中道至少在吐蕃兼併羊同甚至更早以前就已經形成，成為西藏高原與中亞古國之間物質文化交流的重要孔道。1990年在西藏拉薩曲貢村發掘了一處石室墓地，其中一座墓中出土了一件鐵柄銅鏡；這種形制的帶柄鏡，與中國黃河、長江流域唐以後所出的帶柄銅鏡不屬於同一個大的文化系統，是可以斷定的。就世界範圍而言，古代銅鏡大體上可以分為東、西兩大系統：一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圓板具鈕鏡，二是流行於西亞、中東以及中亞諸古文明中的帶柄鏡。曲貢村石室墓出土的這件帶柄鏡，無疑應當歸屬於後者，筆者認為這很可能就是通過中亞傳入吐蕃的（見圖1）。據目前已知的考古材料，類似於曲貢石室墓這種形制的青銅帶柄鏡，過去曾在藏南河谷地區發現過，其形制與曲貢的帶柄鏡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據筆者所作的研究，這類帶柄鏡除西藏之外，在中國境內出土最多的地區是在新疆，如輪台群巴克墓葬、新源鐵里木克墓地、鞏乃斯種羊場石棺墓、和靜察吾乎溝口2號墓地、吐魯番艾丁湖古墓等都曾經出土過。從年代比較來看，新疆所出土的帶柄鏡年代普遍要早於西藏，前者最早可至西周，最晚可至漢代，大體上為公元前10世紀至公元前後；而後者的年代據初步研究約為春秋戰國至東漢時期，大體上相當於公元前5世紀至公元3世紀。所以，西藏高原的帶柄鏡，很有可能是從新疆地區傳入。在阿里高原佛教文化傳入之後所繪製的壁畫中，還保存有手執帶柄鏡的人物形象，觀察其帶柄鏡的形制，與新疆地區所出者幾無區別，這一方面說明使用帶柄鏡的傳統在西藏西部地區可能持續了很長的時間，另一方面也證明了西藏帶柄鏡的來源，很有可能是通過古代的象雄（羊同）傳入到吐蕃腹心地區的。進一步追溯，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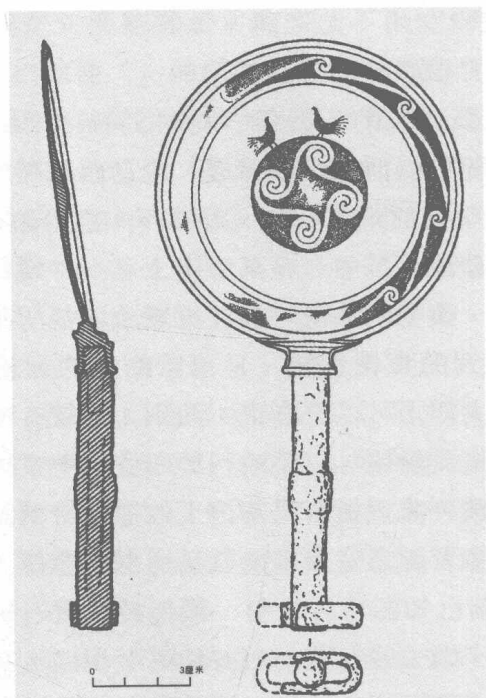


圖 1 西藏拉薩曲貢遺址中出土的帶柄銅鏡

可以發現，新疆地區的這種帶柄鏡實際上又與中亞一帶的同類鏡形之間有着十分密切的聯繫。從形制排比的結果來看，與新疆地區出土的帶柄鏡形制最為接近的，是蔥嶺以西、以米努辛斯克盆地為中心的這一區域發現的青銅帶柄鏡，而且這一地區所出土青銅鏡的年代，又普遍早於新疆地區。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西藏出土的帶柄鏡，是以新疆地區為中介，從中亞傳入西藏西部，再傳入到吐蕃腹心地區的。這條傳播路線，有極大的可能即為後來所說的「中道」的雛形。

此外，考古發現的古代岩畫也表明，古代的象雄與其北方的阿克賽欽、喀什米爾等地，早已有一定的交通聯繫。近年來，新疆地區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葉城東西的達布達布、布侖

木沙、普薩以及皮山等地，發現了多處岩畫（見圖2），主要刻劃山羊、大角盤羊、犛牛等動物以及狩獵場面，岩畫的內容題材、風格技法與阿里地區所發現的岩畫完全相同，證明其時代相近，岩畫作者的族屬也當相同（見圖3）。這部分岩畫中沒有發現佛教的內容，所以新疆的考古工作者推斷其製作年代在公元前，可備一說。1979年，由德國、巴基斯坦和法國等國學者所組成的一支考古調查隊沿中巴公路（又稱為喀喇崑崙高山公路）一線進行了考古調查。這條公路南起巴基斯坦北部的印度河谷平原，接着向西進入喜馬拉雅山西端的高山峽谷，然後經過帕爾巴特峰附近，再向北進入喀喇崑崙高山中的吉爾吉特河谷和洪紮河谷，最後進入中巴邊境的紅其拉甫山口，北



圖2（上）新疆葉城皮山岩畫發現地點；（下）岩畫畫面局部